



刻刀凝古韵 剪纸续华章

——非遗传承人刘传杰让平遥剪纸焕发新生

记者 张凯鹏



刘传杰 记者 白梧煜 摄

方寸彩纸翻飞,剪刀游走生花。走进平遥古城,顺着青石板路寻到聚泰剪纸老店,木门轻推,一股淡淡的纸香扑面而来。店内墙面挂满剪纸作品,窗花、长卷、民俗纹样层层排布。市级非遗刀刻套色点染剪纸项目传承人刘传杰,正端坐在木案前,低头握刀。刻刀游走,细碎的纸屑如雪片簌簌落在案头,薄薄一张彩纸,在他手中慢慢显露出丰富层次。古城里的这家老店,是传承七代人的剪纸老铺,也是远近游客来到平遥总要驻足看一看的非遗打卡地。

在平遥,剪纸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扎根乡土的民俗。这项技艺始于南北朝,在晋中大地上绵延 1500 多年。过去在平遥,一到年节、婚嫁、乔迁,家家户户都要贴窗花。炕头灯下,妇女们拿起剪刀,剪下“蛇盘兔必定富”“蛤蟆抱金砖、辈辈出人才”的吉祥纹样。一句句口耳相传的民间谣谚,藏着老百姓对安稳日子最朴素的期盼,这份剪纸手艺,便是从这样的农家炕头一代代传下来的。

聚泰剪纸是古城里传承百年的剪纸世家。刘传杰的母亲侯全英,是第六代传承人,深耕剪纸 50 余年,2011 年获评山西省杰出剪纸文化传承人。儿时的刘传杰,几乎天天守在母亲和祖母身边。昏黄灯光下,老人一边剪纸,一边给他讲窗花里的民俗故事。8 岁那年,他第一次拿起剪刀,学着勾线、镂空、点染。小小的手掌,反复练习走线,手上时常被剪刀划伤,可他依旧对这门手艺着迷,剪纸艺术的种子,就这样深深扎进他心里。

想要把这份剪纸手艺做深做新,不能只守着老窗花。为精进技艺,刘传杰一路求学打磨。1997 年赴西安美术学院学习工艺美术设计,之后先后拜入宗有福、王占、李治国等剪纸名家门下,潜心钻研刀刻、点染、套色整套技法。数十年伏案苦练,刘传杰练就一身稳当的手上功夫,刀走行云,纸随心动。

工坊之内,作品包罗万象,既有老百姓喜爱的民俗窗花,也有气势恢宏的巨型长卷。《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二十四孝》《三国演义》等长卷徐徐铺开,最长的作品达到 25.8 米,线条绵密,细节饱满,观者站在卷前,不由得心生震撼。2012 年,由他与母亲创办的杰艺苑艺术中心获评晋中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这座场所也成了剪纸技艺展示、研学交流的重要阵地。

“老手艺不能守旧,每一代人都要有自己的突破。”刘传杰说。接过百年技艺,他不想只复刻老一辈的窗花。他跳出传统民俗题材,大胆把《兰亭集序》书法气韵、齐白石花鸟画意融入剪纸创作,乡土剪纸多了书卷雅致。他耗费心血打磨的 11 层叠色剪纸,多层色彩叠加,立体饱满,工艺难度极高,这件作品在 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平遥乡土手工艺走出古城,登上国家级艺术殿堂。

日复一日,老店剪声不息。如今的刘传杰,依旧每日静坐案头创作,接待进店游客。他心里装着剪纸事业长远的规划:计划打造剪纸专题展馆,陈列家族留存的清代、民国老剪纸原件,完整梳理传承脉络。同时,紧扣时代主题持续创作,用剪纸讲述新时代晋中故事。他还计划带着剪纸技艺走进乡村、校园,带动更多乡村妇女、青少年认识剪纸、热爱非遗,让这门老手艺代代接续。

凝视大地的语言

——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梁鸿的文学告白

记者 史俊杰

不急不躁,秋阳正好。平遥电影宫“站台”露天剧场里,对话的主题叫“关键时刻——注视与叙事”。贾樟柯请来了 3 位讲述者:摄影家刘香成、作家梁鸿、媒体人李鸿谷。

轮到梁鸿说话时,她先讲了一个场景。2008 年 7 月 3 日,暴雨刚过,她回到梁庄。站在村头,野草蔓生,已经把村里的主路盖住了。“一个村庄人多了,路是光洁的;人少了,野草才能爬到路的中间。”那一刻,她突然觉得,这个村庄的过去和现在,才真正呈现在眼前。

李鸿谷问梁鸿:“回到故乡,你的决定性瞬间是什么?”梁鸿的回答是从“注视”开始的。她说,自己常年回家探亲,一年回去好几次,但那都是“注视”——看,却没有真的看见。直到 2008 年那个夏天,当她带着“有意识的眼光”回到梁庄,才从“注视”进入“凝视”。“凝视才能更深刻、更深入地抵达,而这种抵达才有我们对自己、对家乡、对人生、对人性的深刻洞见。”

她讲了自己写作《中国在梁庄》时的“三不写”:不写成论文,不写成抒情散文,不写成小说。“我常年研究乡土抒情文学,看够了那种把村庄写成封闭、保守、落后,把农民写成封闭、愚昧的原型。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完全封闭的,它一定跟时代共在。”

也因此,梁鸿让农民的自述成为主体,把自己放在“农民的女儿”的位置上。“农民的语言是一种大地的语言,跟当地的历史、气候,甚至地理有很大关系,那种腔调是我们没有的。”

写《中国在梁庄》前后,梁鸿在梁庄待了 5 个月。她说那不是“采访”,是“生活”。她发明了一个词叫“沉浸式采访”。“我的任务是对我遇到的人、遇到的地方认真真感受、认真真体会。”

她与梁庄一位女性一起劳动,十几年来每年暑假、寒假、秋天,一块儿下地。那位女性凌晨 4 点 40 分起床,她也跟着一起起床。夏天 40 多摄氏度的太阳烤着后背,她也跟着一起晒。“我可能只是几天,他们劳动了一辈子。我想把炎热、太阳烤在皮肤上的感觉写出来。”

《要有光》的写作,在梁鸿的创作谱系中似乎是“意外”——从农村题材到青少年心理健康。“读梁庄会发现里面



梁鸿 资料图

非常多孩子,他们的孤独、内在情感的缺失、精神某种压抑都是有的。”

真正让她决定写这本书的,是她作为一个母亲的困惑。“在我的孩子成长过程中,我有非常多的困惑,我觉得我挺用心做一个妈妈的,但我感觉做不好。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博士就比别人做得好。”她发现,亲子教育和情感教育非常缺失。她采访了很多孩子、家庭、医生、老师、校长,最后完成了《要有光》。

“很多人埋怨我,你凭什么把责任都放在家庭上?我只是说,教育是一个系统性的事情,但家庭、家长,包括我们自身,都是独立的个体,你迈了那么一小寸步,每个人都迈一小寸步,这个时代就多了一点空间。”

一位观众问梁鸿:“你的行动力源自何处?”梁鸿说:“千言万语一句话,我是个‘傻大胆’,就是比较傻。”台下笑了。她接着说:“我特别看重自己内心情感,就是我的方向。我遵从我的内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来自情感巨大的驱动力。”

她又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生活的一分子,你的情感冲动,一定也是很多人情感的冲动,写出来一定有一部分人有共振。”

从梁庄的野草蔓生,到《要有光》中孩子们的内心困境,梁鸿的目光始终注视着这片大地上具体的人。她说,先生活,再判断;先凝视,再叙事。那个瞬间,在梁鸿的笔下,是 2008 年 7 月 3 日,暴雨过后的梁庄村头,一条被野草覆盖的路。那是她“前世的联系、今生的通道”。

